

青年发展视角下新时代青年人口的性别差异探究

■ 陆杰华 冯雨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教育投入不断增加、计划生育政策演化调整 and 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跃迁的宏观背景下,本研究基于青年发展视角探究了新时代青年人口在教育、就业、婚育、健康等领域存在的性别差异和两性青年面临的差异化挑战,并由此引出有关青年性别研究的进一步学理思考,提出下一步研究应重点聚焦性别比失衡引致的社会风险、释放青年性别红利、低生育率背后隐藏的青年发展困境以及促进两性青年充分均衡发展的相关公共政策,以期促进青年人口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青年发展 青年人口 性别平等 性别差异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1.009

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1],性别平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面向。联合国指出,青年发展之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具有重要意义^[2],强调“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是制定青年政策的核心原则^[3],而改善青年女性的境况则是青年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共同经历的经济社会变革和重大历史事件形塑了同一世代青年人口的共同特征和发展图景,同时青年内部的分化也不容忽视。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不同社会特征的青年人口在发展目标上的首要任务和发展途径上的主要困难存在差别^[4]。

青年发展既是人类发展进程的集中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发展水平^[5]。不同性别的青年人口在教育、就业、结婚、生育、健康等各种重要的生命事件中面临差异化的挑战,能否“平顺”地度过青年期,解决好“烦心事”,将引发未来生命历程中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一代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性别平等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在青年发展视角下,侧重分性别探究青年人口的结构差异,区分两性青年面临的不同困境,并进行学理思考,以期促进两性青年平等和谐发展。

收稿日期:2023-11-06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

冯雨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课题编号:20ZDA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新时代影响两性青年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差异化路径

青年是时代的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主要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拥有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条件,呈现出与社会共同发展、平行发展的新形态^[6]。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上,现代化转型、互联网社会兴起、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等全球通性,与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市场化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计划生育政策不断优化等中国特有的国情相互交织^[7],从不同维度拓展了两性青年的发展空间,建构起二者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开拓了青年发展的新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时代的重大变迁,推动了以经济参与为主的青年发展格局。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明显增强,在职业选择上逐渐离开“稳定”的“铁饭碗”,向开放、多元、现实等方向发展^[8]。随着国家将劳动力配置的权力让渡给市场,原本受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保护的女性就业机会和权益逐渐弱化^[9],女性面临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显现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25-49岁黄金劳动年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1990年的91%下降至2010年的83.2%^[10],青年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利地位。进入21世纪后,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平台、新模式不断涌现,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新机遇,新兴青年群体开始摆脱“职业依附”^[11],涌向去雇主化和灵活性的就业形态,比如文化产业和生活服务业等^[12]。新业态灵活弹性的工作模式、宽松的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突破时空限制的工作环境等不仅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配置^[13],也有助于与女性的职业和家庭特征形成互补^[14],平衡工作和家庭,减少男女体力上的差异^[15],为青年女性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但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青年人口更直接、频繁地暴露在不确定风险中,两性青年风险抵抗能力的差异亦可能导致二者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第二,面向青年群体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强,为两性青年的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教育经费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递增^[16],由2000年的3 849.0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9 561.85亿元,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进一步增长到61 329.14亿元^[17],极大地推动了青年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义务教育实施于1986年,2008年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18],2012-2021年在全面普及的基础上实现了县域基本均衡发展,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从99.85%提高到99.9%以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长期存在的辍学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19],教育资源的扩大和均衡发展极大地改善了“90后”“00后”青年人口在小学、初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20]。普通高校的扩张始于1999年,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21],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22]。20多年来,中国女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扩张幅度高于总体水平^[23],这一突破无疑有助于新时代青年女性全面发展进步。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优化交织于青年人口的生命历程中。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并于2012年起逐步放开生育二孩、三孩,分别对应“90后”“00后”青年人

口出生和进入育龄期的两大时间节点。一方面,生于独生子女家庭的“90后”“00后”青年,在家庭缺乏异性子女参照、父母对子女的性别角色期望较为模糊的情况下,他们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经历的性别角色差异,以及成长过程中累积的社会网络的性别分化较少^[24],因此这部分青年在教育、职业发展层面应趋向平衡。另一方面,随着二孩、三孩政策放开,以生育事件为节点,两性青年人口的发展趋势发生分异,女性在生育后通常需要在家庭领域与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这将加剧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女性每周工作时间、正规就业概率、工资水平以及身心健康等带来负面影响^[25-26]。

第四,现代性引致思想文化跃迁,两性青年婚姻家庭观念出现分化。成长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以及新技术和新媒体迅猛增长的历史阶段,青年一代的性别角色观念整体朝向现代化发展,性别平等意识不断增强,女性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得以确立并稳步发展。但中国男女的性别观念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状态,两性性别观念的现代化实际上并不同步,男性的性别观念较女性更加传统^[27-28],传统的性别规范与现代的性别期望在公私领域不时发生碰撞,使两性青年在身份认同上陷入困境。青年的个体化趋势是思想文化跃迁的方向之一,具体表现为青年人“脱嵌”于旧有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融入新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中。于婚育观念而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口持有不婚、丁克等非传统的婚育观念,但同时,“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模式和高住房成本下对父母的经济依赖又将青年人口置于传统和现代矛盾交织的发展阶段。

二、新时代青年人口性别差异的主要特征

(一)青年人口规模和性别结构特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15-34岁的青年人口数量超过3.6亿,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约为25.79%,其中,城镇青年人口数超过2.6亿,占城镇总人口的28.9%,农村青年人口数超过1亿,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0.3%,青年人口城镇化率约为71.54%,超过全国城镇化水平(63.84%)。就性别结构而言,我国青年人口性别比为110.36,远超出总人口性别比(104.8),其中,城镇青年人口性别比为106.44,农村青年人口性别比为120.91。总体上看,青年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且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二)青年群体教育的性别差异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张,青年女性在教育发展上取得很大突破,教育的性别差异发生逆转。总体来看,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青年女性占比达到39.11%,高于青年男性约5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在城镇和农村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表1显示,城镇有27.32%的青年女性受过高中教育,占比最大,有23.53%受过初中教育,22.27%的女性受过大学本科教育;而青年男性受教育程度占比排在前三的分别是高中(30.07%)、初中(26.23%)和大学专科(20.12%),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男性占比为18.63%,比青年女性低了近4个百分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女性在高中升大学时占有优势,但是在博士阶段,青年男性的规模和占比(0.19%)依然高于青年女性(0.16%),女性的教育优势被过滤掉了一部分^[29]。在九年义务教

育结束后,农村青年初中升高中的优势远低于城镇青年,约一半的青年男性(51.80%)和青年女性(49.99%)仅受过初中教育;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农村青年男性占比为16.91%,不仅低于农村青年女性(19.67%),更远低于青年人口平均水平(36.28%);除此之外,农村地区仍有接近40万的青年女性和超过35万的青年男性未上过学,基础教育的欠缺使这一群体在就业等方面面临阻碍。

表1 2020年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的性别差异(%)^①

受教育程度	总体		城镇		农村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未上过学	0.31	0.36	0.18	0.18	0.62	0.84
学前教育	0.08	0.09	0.08	0.08	0.10	0.11
小学	3.73	3.88	2.63	2.55	6.34	7.46
初中	33.82	30.70	26.23	23.53	51.80	49.99
高中	28.33	25.85	30.07	27.32	24.22	21.92
大学专科	17.39	18.96	20.12	21.44	10.93	12.29
大学本科	14.77	18.12	18.63	22.27	5.63	6.93
硕士研究生	1.37	1.87	1.81	2.42	0.31	0.41
博士研究生	0.19	0.16	0.25	0.21	0.04	0.04

(三)青年群体就业的性别差异

2020年,我国16-34岁青年人口的就业率为62.14%,其中青年男性在业率为69.37%,高出青年女性(54.33%)约15个百分点。表2显示,在各年龄段,青年男性的在业率均高于女性,随着年龄增长,两性青年在业率的差距逐渐增大,30-34岁两性青年在业率的差异超过20个百分点。在25-29岁、30-34岁年龄段,城镇青年相对于农村青年的就业优势开始凸显,农村女性就业率居于劣势,并且与农村男性存在较大差距。

表2 2020年青年人口在业率的性别差异(%)^②

		总体			城镇			农村		
		男性	女性	差异	男性	女性	差异	男性	女性	差异
总体		69.37	54.33	15.04	68.09	54.75	13.34	72.32	53.26	19.06
年 龄 段	16－19	14.64	9.93	4.71	11.60	7.79	3.81	21.73	15.25	6.48
	20－24	58.43	46.83	11.6	54.36	44.94	9.42	67.97	51.71	16.26
	25－29	87.55	68.74	18.81	87.66	70.84	16.82	87.29	63.50	23.79
	30－34	91.08	69.84	21.24	91.68	71.41	20.27	89.72	65.72	24.00

①②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青年人口性别收入差距明显,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差距进一步扩大。表3显示,2020年,18-34岁青年男性的年平均收入为6.904万元,而青年女性仅为4.137万元,两性平均年收入差距约为2.767万元,占同年青年男性年平均收入的40%。除了18-19岁年龄段,其余年龄段青年男性的年平均收入均高于女性,且差异随年龄的增大不断扩大,30-34岁年龄段的年平均收入差异高达6.052万元,占同年龄段青年男性年平均收入的55.38%。农村青年的年平均收入低于城镇青年,但性别收入差异高于城镇,农村青年女性的年平均收入水平最低。

表3 2020年青年人口平均收入水平的性别差异(千元)^①

		总体(样本数:1434)			城镇(样本数:539)			农村(样本数:895)		
		男性	女性	收入差	男性	女性	收入差	男性	女性	收入差
总体		69.04	41.37	27.67	78.83	55.46	23.38	62.16	33.95	28.21
年 龄 段	18－19	2.28	3.43	－1.15	0.76	3.20	－2.44	2.88	3.60	－0.72
	20－24	26.13	16.48	9.65	20.23	20.07	0.16	30.95	14.08	16.87
	25－29	85.12	63.32	21.81	92.17	85.11	7.06	78.44	52.66	25.79
	30－34	109.29	48.77	60.52	137.08	75.04	62.05	93.19	37.05	56.14

(四)青年群体婚育的性别差异

1. 婚姻状态的性别差异

我国青年人口的婚姻状态呈现以下鲜明特征。首先,青年人口结婚率的性别差异较大,尤其在农村更为突出。根据表4,2020年,15-34岁青年男性的结婚率为38.68%,较女性低12个百分点;农村青年女性结婚率为54.51%,在各年龄段的结婚率均为最高;农村青年结婚率的性别差异高于城镇,且这一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大不断扩大,30-34岁农村青年女性的结婚率为90.57%,比同年龄段青年男性高出16.65个百分点。其次,青年人口婚姻状态的稳定性下降,15至34岁青年人口的离婚率为1.31%,即100个人中约有1人离婚;城镇青年男性的离婚率略低于女性,而农村青年男性的离婚率却高于女性,农村30-34岁青年的离婚率性别差异最大,差距约为1.67个百分点;而且随着年龄增大,青年人口的离婚率不断上升。最后,青年男性的初婚年龄普遍晚于女性,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城镇青年男性当年的初婚年龄约为24.25岁,比城镇女性晚1岁,而农村青年男性的初婚年龄为22.95岁,比农村女性晚1.4岁。

2. 青年群体的生育状况和生育意愿

表4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青年女性的生育率为55.42‰,农村青年女性的生育率为69.93‰,均高于全国育龄妇女生育率(37.26‰);城乡青年女性的一孩生育率相差不大,但就二孩和三孩生育率而言,城镇青年女性比农村青年女性低7个百分点;分年龄段来看,城镇青

^① 数据来源:根据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上年度全年的职业或劳动收入”计算得出。

年女性生育一孩的高峰在25-29岁,生育二孩、三孩的高峰在30-34岁,而农村青年女性生育一孩的高峰在20-24岁,生育二孩、三孩的高峰分别在25-29岁和30-34岁。

表4 2020年青年人口婚姻状态的性别差异(%)^①

		总体		城镇		农村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总体		38.68	50.51	38.56	48.92	38.95	54.51
结婚率	15-19	0.28	1.11	0.18	0.67	0.51	2.13
	20-24	8.71	19.34	7.19	15.49	12.29	29.25
	25-29	45.86	65.40	44.88	62.44	48.03	72.79
	30-34	76.39	87.86	77.46	86.83	73.92	90.57
总体		1.33	1.29	1.05	1.24	1.96	1.44
离婚率	15-19	0.004	0.01	0.002	0.005	0.01	0.02
	20-24	0.15	0.26	0.08	0.17	0.30	0.51
	25-29	1.19	1.34	0.87	1.16	1.90	1.81
	30-34	3.00	2.63	2.43	2.63	4.31	2.64

根据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结果,至少一半以上的18-34岁青年人口希望有2个孩子;青年女性希望不要孩子的比例则高于青年男性,城镇青年女性中有近20%的人不愿意有孩子,而农村青年女性不愿意有孩子的比例约为8%,分别高出青年男性6个和3.6个百分点。

表5 2020年青年女性的生育状况(%)^②

		城镇				农村			
		生育率	一孩生育率	二孩生育率	三孩生育率	生育率	一孩生育率	二孩生育率	三孩生育率
总体		55.42	29.17	22.48	3.77	69.93	29.86	29.49	10.57
年龄段	15-19	3.45	2.93	0.48	0.04	12.51	9.93	2.33	0.25
	20-24	42.34	30.42	10.54	1.39	87.72	52.28	28.93	6.51
	25-29	94.48	56.69	32.75	5.04	110.29	46.51	48.25	15.53
	30-34	65.31	23.70	35.13	6.48	64.37	15.79	32.70	15.88

(五)青年群体健康的性别差异

随着青年卫生保健、营养健康水平的提升,青年人口健康状态不断改善,2020年,20-39

①②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岁成年人的体质达标率达到87.2%,青年人口体质状况不断向好。但同时青年男性和女性面临差异化的健康问题。首先,根据《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成年人超重率、肥胖率持续增大,青年男性肥胖率较女性更高;部分30岁以下的青年女性存在体重偏低的现象^[30],这可能诱发潜在的健康风险。其次,通过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计算得出,15-34岁的青年人口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约有80%的青年认为自己比较健康或很健康,农村青年女性平均自评健康得分相对较低,超过23%的农村青年女性认为自己健康水平一般或更差,农村青年女性在健康、经济、社会多个层面呈现明显的脆弱性,更易遭受健康风险的冲击,需要加强健康干预。最后,青年人口心理健康不容忽视,根据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城乡青年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陷入抑郁或沮丧,总是、经常或有时感到心情抑郁、沮丧的比例均超过30%,比男性高出约10个百分点。

三、新时代两性青年发展面临的差异化挑战及成因分析

青年群体是“标志时代最为灵敏的晴雨表”,面对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与社会变迁相伴随的一系列结构紧张,青年发展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现实图景,两性青年人口的发展路径产生分化。结合新时代影响青年发展的社会背景和青年人口特征的性别差异,我国两性青年面临的差异化挑战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教育的性别差异突出,且青年女性的教育优势并未转化为其他领域的优势。教育既是现代社会影响劳动参与、职业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也对青年的婚姻选择和家庭生活具有重要影响^[31],教育的性别差异对促进青年女性发展和扭转社会性别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青年女性的教育优势并未真正转化为其他领域的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中,青年男性与女性在人力资本方面的趋同并未给女性带来更多优势,青年女性在业率和年收入水平仍明显低于男性,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女性的境遇进一步恶化,就业参与远低于相应教育层次的男性^[32];女性职业发展存在“玻璃天花板”效应,当教育程度较好的女性尝试向上流动时,时常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等无形障碍的束缚。对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传统的理论解释常聚焦于人力资本和职业隔离,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和职业隔离的减少^[33-34],上述理论的解释力也受到质疑,性别歧视愈发成为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异的主要解释因素^[35-36]。生育是构成影响青年女性的人力资本禀赋、导致职业间断的关键事件,随着我国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在婚姻家庭领域,高学历青年女性“失婚”现象屡见不鲜,传统“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模式广泛存在,导致了高学历女性的婚姻匹配困境。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女性形象的建构仍在一定程度上被框定在性别主导的社会文化中。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女性医护工作者的报道通常强调其基于性别和家庭角色的“牺牲”,而其作为医护的职业身份、专业能力和实际贡献被抹杀,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主体性被消解^[37];又如,高学历女性的“剩女”标签,来自男权想象中女性部落的“适婚焦虑”等,都是对高学历女性施加的“符号暴力”^[38]。

第二,青年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婚姻市场中的男性婚姻挤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青年人口性别比高达110.36,性别结构失衡主要来自农村地区两性青年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本质上是由个体社会成员的出生性别选择行为导致的。对于正处于适婚年龄的青年人口,性别比失衡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稀缺性”,而男性在一定程度上则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相对过剩人口,不得不面临持续走高的婚姻成本。农村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受到的婚姻挤压更为严峻,农村30-34岁年龄段的青年男性已婚比例远低于同年龄段的农村青年女性。随着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选择权和自主性不断提高,大量农村青年女性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封闭保守的“通婚圈”,选择外嫁;而农村青年男性则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个人择偶能力下降等限制,在“破圈”的婚姻市场中遭受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男性的婚姻挤压,很少娶到“通婚圈”外的女性^[39]。

第三,在家庭领域,青年女性面对的角色紧张和工作家庭冲突加剧。在传统的性别规范和社会角色中,男性的成功通常与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女性的角色则通常与为人母、为人妻相关。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现实的社会角色和传统的家庭角色形成了两套行为规范:一方面,青年女性处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另一方面,“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角色期待将女性卷入家庭,在无偿的家庭劳动和孩子的抚育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双重角色负担下,青年女性面临着更加突出的工作家庭冲突。新时代青年女性成长于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和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跃迁的社会背景中,形成了追求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性别平等和相互尊重等新的价值追求,但不同代际、不同性别的群体间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转变并不同步,传统角色观念和新的价值追求相互碰撞,给部分青年女性带来困惑和焦虑的情绪。

第四,不确定性增加对两性青年的身心健康带来持续的挑战。在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变迁中,新时代青年虽然比父辈拥有更广阔和自由的选择,但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空前流动性的社会^[40]以及就业、婚恋、住房等发展成本的急剧增加,对人生预期的不确定性逐渐加大给青年人口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和不安感,由此引发了锻炼不足、睡眠不足、饮食不均衡、焦虑和抑郁日趋严重等可预见的不良健康后果^[41]。与青年男性相比,青年女性还面临更多的身体形象和外貌方面的压力。有研究指出,青年女性受现代审美理想的制约程度比男性更深^[42],制度困境下的情感体验、大众媒体建构的单一审美场域、消费文化背景下女性外貌的商品化和个体对美貌本身的认知与追求引发了部分青年女性的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还有部分青年女性存在体重过低等问题。

第五,农村青年女性面临多重生存、发展困境。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为广大农村青年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发展空间,农村青年女性在教育、卫生、经济资源取得等方面获得了有效保障,但相较于城镇青年和农村青年男性,农村青年女性在教育、就业、婚育和健康方面则仍然脆弱。在教育层面上,农村地区对女性的社会期望和道德规范更趋于传统,虽然义务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农村女孩进入小学、初中学习的机会,但家庭层面的教育投入相对欠缺,农村青年女性在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上仍占据较大规模和比例。在就业层面上,约25%的农村青年

女性选择从事农林牧渔业,农业劳动呈现女性化趋势。对此有研究认为,参与农业生产能为农村妇女提供实现价值的舞台,对提高妇女地位具有进步意义^[43];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指出“生产参与、决策边缘、技术无缘”是农村妇女参与农业的主要特征^[44],从事农业劳动而非向城镇流动是农村青年女性被边缘化的表现。在婚育层面上,农村青年性别比严重失衡,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青年增加,这有可能催生买婚、骗婚等非常态婚姻和性行为失范引致的公共安全问题^[45],增加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安全风险。在健康层面上,农村地区必要的健康和福利设施相对匮乏,农村青年女性在生殖健康、生病就医等方面面临更多困难。

四、新时代两性青年发展的研究展望

青年发展体现了青年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其生存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关联^[46],在社会发展的特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诸多因素影响下,两性青年人口在教育、就业、婚育和健康层面表现出差异化的增长和演进过程。两性青年的充分、均衡发展与社会风险治理、人口红利、人口再生产等影响国家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紧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和空间。基于以上,下一阶段两性青年发展研究应重点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青年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社会风险。15-34岁的青年人口已处于或正步入婚龄期,青年人口的性别比失衡首先将对婚姻市场中的男性带来婚姻挤压,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不断扩散到社会和家庭层面,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47-48]。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探究青年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产生原因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做好“预前”防范和“预后”治理^[49],推动人口均衡发展。

第二,消解影响就业公平的障碍因素,释放青年性别红利。性别红利是女性赋权和女性潜能发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人口红利^[50]。新时代青年女性成长于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获得极大提升,同时受到独立自主、性别平等观念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上一代有更加良好的表现。相对于青年男性,青年女性的就业率仍存在上升空间,若能进一步明晰青年性别红利释放的潜在空间和内在机制,有针对性地消解妨碍女性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因素,有助于释放青年女性新的生产潜力,扭转青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

第三,透视低生育率背后育龄青年的多重生存发展困境。低生育率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其背后折射出未婚青年比例增高、青年人口性别比失衡、婚育年龄推迟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下降等现象。两性青年的发展困境,尤其是在婚育层面面对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压力和冲突,是隐藏在低生育率后的现实因素。厘清育龄青年的多重生存发展困境及其与单身、晚婚、晚育、生育意愿下降等现象的关联,是理解和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有必要引发更深入的关注和讨论。

第四,将两性青年充分、均衡发展纳入青年发展政策的考量。青年发展根植于社会发展,

青年发展面临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我国两性青年发展在现阶段表现出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本质上反映出男性和女性在家庭领域和经济社会参与中的权力仍不对等、性别平等发展尚不充分。促进性别平等是国家的责任^[51],将两性青年充分、均衡发展纳入青年发展政策的考量,保障两性青年的权益和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实现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建设更加公正、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参 考 文 献]

- [1]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263.htm#1
- [2] 联合国大会:《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50-81>
- [3] United Nations: World Youth Report: Youth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world-youth-report/wyr2020.html>
- [4] 风笑天 廉 思 邓希泉 等:《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发展与青年政策(笔谈)》,载《青年探索》,2022年第3期。
- [5] 邓希泉:《青年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6][11] 邓希泉:《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历程与多维迭代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 [7] 陆杰华 郭荣荣:《代际社会学视角下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 [8] 王彦玲:《当代青年职业价值取向变迁研究》,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9][24] 吴愈晓 吴晓刚:《1982—2000: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载《社会》,2008年第6期。
- [10] 沈 可 章 元 鄢 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载《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 [12] 李春玲 刘保中 李 闯:《新兴青年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中的新力量》,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 [13] 秦广强 梁甜静:《出身、能力与兴趣:新兴青年的职业获得研究》,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 [14] 毛宇飞 曾湘泉:《互联网使用是否促进了女性就业——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载《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6期。
- [15] 徐阳晨:《迎接新时代女性劳动力发展新机遇》,载《中国妇女报》,2023年12月1日。
- [16] 邓希泉 张 乐 等:《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载《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4期。
- [17] 教育部 国家统计局 财政部:《关于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2312/t20231202_1092896.html
- [18] 《全面解读2008年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http://www.npc.gov.cn/zgrdw/npc/zfjc/ywjyf/2008-09/24/content_1452520.htm
- [19]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成就》,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598/sfcl/202206/t20220621_639118.html
- [20] 邵 岑:《教育扩张与教育获得性别差异(1978—2008)》,载《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 [21]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教体系》,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18/content_5690915.htm
- [22] 教育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9.6%》,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167/mtbd/202303/t20230323_1052379.html
- [23][29] 刘 江 张文明:《女性教育突破与学历攀登——对中国(2001—2020年)本硕博教育性别逆转现象的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8期。
- [25] 李 芬 风笑天:《生育政策调整下年轻父母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全国十二城市的调查》,载《广东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 [26] 张海峰:《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DID-PSM方法的证据》,载《西北人口》,2022年第3期。
- [27] 刘爱玉 佟 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

2期。

[28] 吴愈晓 王金水 王旭洋:《中国性别角色观念变迁(1990—2018):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及性别差异模式》,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30] 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https://www.gov.cn/guoqing/2023-03/12/content_5745851.htm

[31] 许 琪:《教育性别差异逆转与中国夫妇地位匹配模式的变迁》,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32] 刘爱玉:《脆弱就业女性化与收入性别差距》,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33] 李春玲:《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与变化趋势》,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4] 赵媛媛:《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载《人口学刊》,2017年第5期。

[35] 孔令文:《性别收入差距问题研究新进展》,载《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2期。

[36] 李春玲 李 实:《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7] 陆杰华 韦晓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现实窘境、议题反思与应对路径》,载《河北学刊》,2022年第6期。

[38] 徐家庆:《符号暴力与高学历女性“失婚”困境——基于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分析》,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

[39] 张富富:《农村光棍的形成机制与婚姻抉择——基于时空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载《青年探索》,2023年第6期。

[40] 邓志强:《青年发展规划与新时代青年发展的时空指向》,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41] 田思钰:《新时代青年健康状况的进展与对策建议》,载《北京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42] 刘 燕:《审美与自我呈现: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的深层逻辑》,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43] 孟宪范:《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44] 蔡 弘 黄 鹏:《何谓农业女性化:概念体系的建立与讨论》,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45][47] 刘 涛 王玉涵:《我国性别失衡的社会风险与治理措施研究》,载《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46] 沈 杰:《中国青年发展的分析框架及其测量指标》,载《北京青年研究》,2017年第2期。

[48] 杨 博 李树茁:《性别失衡后果的社会风险及其社区和家庭扩散研究》,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49] 陆杰华 张 韵:《中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视角:“预前”与“预后”》,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50] 朱 荟 陆杰华:《工作抑或家庭: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51] 冯 媛:《国家机制:促进性别平等与发展的基础设施》,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责任编辑:崔 伟)